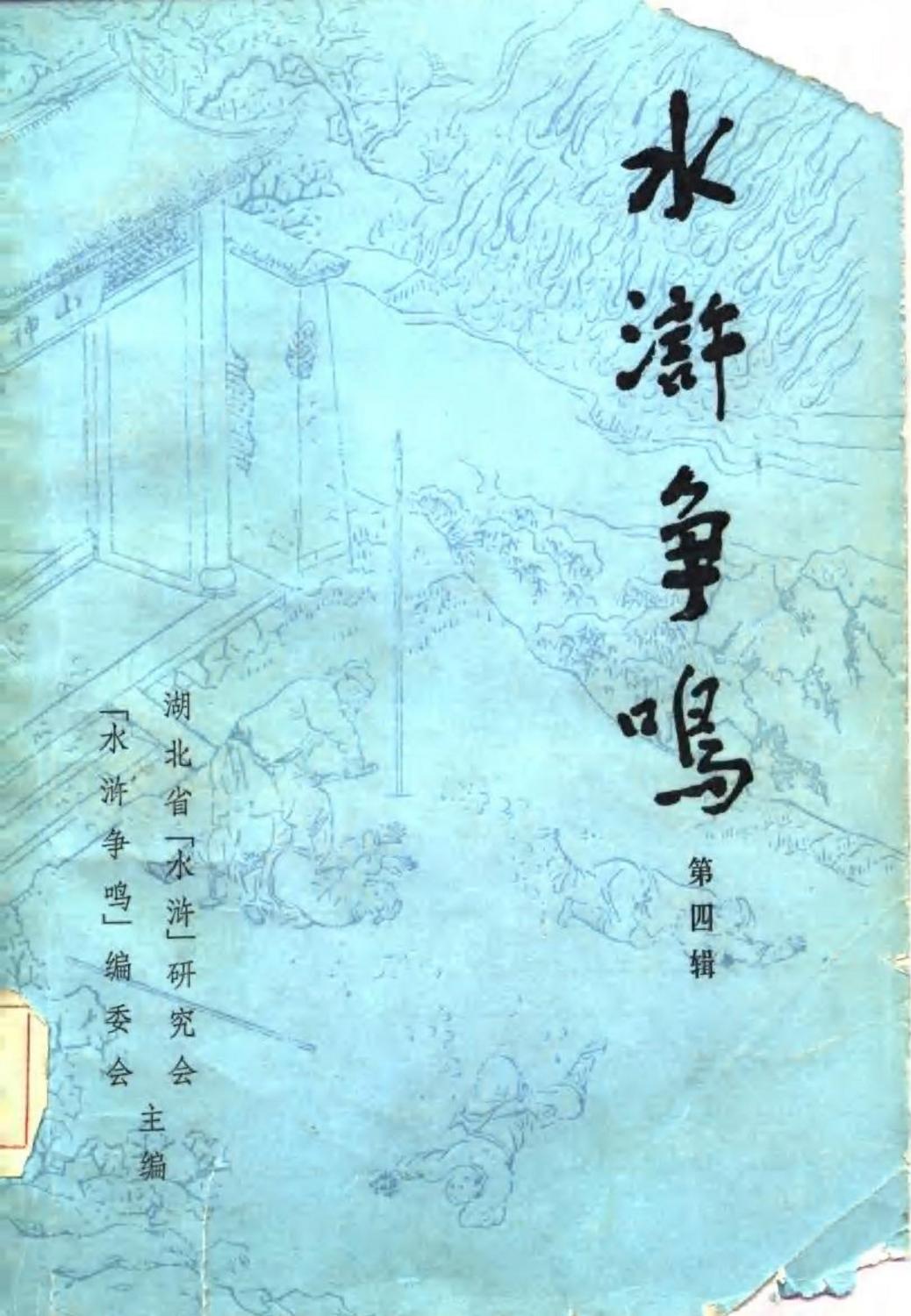


水滸爭鳴

第四輯

湖北省「水滸」研究會
「水滸爭鳴」編委會
主編



水浒争鸣

第四辑

湖北省水浒研究会 编
《水浒争鸣》编委会

*

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湖北省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发行
湖北省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4.5印张 1插页 358,000字
1985年7月第1版 1985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100

统一书号：10107·413 定价：3.60元

《水浒争鸣》编辑委员

(以姓氏笔划为序)

马成生	马蹄疾	刘士兴	刘世德	刘 冬	刘操南
吕致远	张文勋	*张国光	张澄寰	李永祜	李茂肃
*李悔吾	吴文蜀	*吴志达	陈流沙	陈熙中	周中明
胡天风	徐 放	翁柏年	聂铁钢	袁世硕	黄 霖
*黄清泉	黄瑞云	*程一中	喻朝纲	彭 骏	傅隆基
鲁德才	葛楚英	蒋松源	廖仲安	霍松林	

(有*号者为常务编委)

顾 问

(以姓氏笔划为序)

王季思	孙楷第	吴组缃	吴晓铃	吴有恒	胡国瑞	赵景深
顾学颉	程千帆					

目 录

综论

- 论《水浒传》的思想意义 北京师大 郭英德(2)
“水浒文学”与比较研究 黑龙江青年杂志社 伊永文(18)
不能否认《水浒传》是写农民起义的作品
——评“革”“守”斗争说 武汉师院 欧阳代发(24)
梁山泊英雄出身的探索 中南民族学院 何士龙(36)
《水浒》写招安是否背离了现实主义? 江汉大学 王仁铭(44)

《水浒》的历史、地理背景

- 也谈《水浒》的真人真事 北京师院分院 侯会(49)
《〈水浒传〉——虚构中的史实》
一书的序言 [日本] 宫崎市定著 程耀鑑译(56)
《水浒》文史辩析 山东《牡丹》编辑部 朱希江 周谦(61)
《水浒传》与山东 山东《大众日报》 李永先(71)
《智取生辰纲》的地理疏误 湖南 邹振九 北京 樊栋卿(84)

关于《水浒》成书时代的讨论

- 郭勋与《水浒传》 山东大学 袁世硕(90)
《水浒》中的地名证明了什么?
——《水浒》成书“嘉靖说”质疑之一 中国人民大学 李永祜(106)

《水浒》版本考证

- 谈《水浒》的“武定板” 苏州 易名(122)
论巴黎所藏《新刊京本全像插增田虎王庆忠义

- 水浒传》 南京大学 李国才 (129)
映雪草堂本《水浒全传》简介 复旦大学 陆树岑 (142)
《水浒传》映雪草堂刊本——简本和删节本
——《水浒传》版本探索之一 中国社会科学院 刘世德 (154)

《水浒》人物评析

- 论金本《水浒》中的宋江
——兼评所谓金圣叹“独恶宋江”论 济宁师专 汤国梁 (177)
从形象思维的角度看“两种《水浒》、
两个宋江”说 武汉师院 王启和 (189)
李逵——《水浒传》里的喜剧性角色 福建师大 齐裕焜 (191)
论潘金莲 四川社会科学院 胡邦炜 (201)

《水浒》艺术论

- 《水浒传》的叙事艺术 南开大学 鲁德才 (215)
《水浒传》艺术论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研所 孙一珍 (230)
论《水浒传》情节的板块构成 徐州师院 郑云波 (248)
《水浒传》的结构“不是有机的”吗? 荆州师专 王齐洲 (257)
奇情奇景 纵丽如画
——从金批看《水浒传》的绘画美 郴州师专 罗宪敏 (265)
谈谈《水浒》的景物描写 聊城师院 刘中光 (277)
《水浒》的情境创造
——《水浒艺术探微》之一章 上海人民出版社 吴士余 (286)
迷离闪烁 天矫变幻
——《水浒》的梦态描写 光明日报 汪远平 (300)
《水浒》的心理描写 武汉教育学院 张虎升 (312)

《水浒》金批与金圣叹研究

金圣叹文学批评中反对

封建理学的思想 武汉师院 张国光 (323)

略论“自诚明，谓之性”

——读金评本《水浒传》第四十二回的评语 杭州师院 马成生 (340)

金圣叹的“托笔骂世”说 温州地区教师进修学院 卢 淞 (353)

金圣叹的典型观是中国典型理论的成熟 辽宁 李金德 (363)

从“镜子”论看达·芬奇与金圣叹的

美学思想 重庆师院 黄中模 (372)

试论金圣叹、俞万春自身中的矛盾及相互关系 欧阳健 (381)

简评《〈水浒〉与金圣叹研究》 [日本] 中钵雅量著

彭修良 张三夕译 许贺校 (398)

《水浒》的译本及其他

《水浒》新英译本前言及翻译前后 沙博里著

李士钊 妙龄译 (404)

《水浒》俄译本第二版跋 [苏联] 阿·罗加切夫著

北京图书馆 施大文译 (415)

《水浒》日文版译者序言 [日本] 吉川幸次郎著

黄南山译 (423)

《水浒传》词语汇释选例之二 郑州大学 李法白
暨南大学 刘镜芙 (427)

《水浒》武打描写的艺术美 扬州武术协会 王资鑫 (444)

综 论

论《水浒传》的思想意义

北京师大 郭英德

《水浒传》是什么性质的书？这在《水浒传》广为流传之初，就有不同的意见：或斥之为“海盗”之书，或称之为“忠义”之作。建国后，从五十年代起，国内文学评论界基本上一致认为《水浒传》是描写农民起义的作品。近几年来，文学评论界出现了“百家争鸣”的活跃局面，于是在“农民起义论”之外，又出现了“市民说”、“忠奸斗争说”、“农民起义从属忠奸斗争说”等观点。即使是同样持“农民起义论”观点的同志，对梁山泊起义的斗争对象、反皇权思想、招安结局等问题，也有不同意见。这种不同意见的争论，能够促进我们进一步认识《水浒传》的性质、内容和意义。

马克思主义认为，必须“按照事物本来面目及其产生根源来理解事物”。^①我认为，从《水浒传》的整个形象体系加以考察，应该说，《水浒传》是中国封建社会农民革命的一面镜子，它形象地展现了发生于北宋末年的梁山泊农民起义从形成、发展到投降、毁灭的全过程，塑造了一大批生龙活虎的农民革命英雄形象，从而揭示了中国封建社会农民革命的基本特点，即农民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动力、指导思想和前途等。

而且，从《水浒传》产生的根源来看，如怀林所说：“世上先有《水浒传》一部，然后施耐庵、罗贯中借笔墨拈出。”^②《水浒传》的成书，经历了由两宋之交到元末明初长达三百余年的历史时期。

①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第49页。

② 怀林：《批评〈水浒传〉述语》，容与堂本《忠义水浒传》卷首。

在这一时期中，梁山泊宋江起义故事，接受了“忠义军”抗金斗争、钟相杨么起义、元末农民大起义以及繁若群星的农民小型反抗斗争的战斗洗礼，凝结了无数富于反抗精神的被压迫人民的思想、感情、理想、愿望和智慧，经过历代劳动人民的选择、描绘、陶冶、充实和流传，最后由施耐庵精思宏裁，腾笔涌墨，终于成就了这么一部光耀千古的中国封建社会农民革命的史诗。

必须强调指出，《水浒传》整个形象体系所具有的客观思想意义，同《水浒传》作家的思想倾向和创作意图或相一致，或有距离，甚或截然相反，不能将它们混为一谈。本文即拟讨论《水浒传》形象体系自身的基本性质及其客观思想意义，以求教于专家们。

一

梁山泊起义是《水浒传》描写的中心，因此，梁山泊起义的性质，就集中体现了《水浒传》的性质。而梁山泊起义的性质，在根本上，应该由它的客观环境——《水浒传》社会的基本性质所决定，应该由这一社会所显示的革命形势所决定。所谓《水浒传》社会，是指由《水浒传》中众多的人物形象及其相互关系所构成的社会画面。《水浒传》中的人物形象，根源于不同的物质生活条件，组成处于不同的社会地位的阶级、阶层和集团，相互之间发生了一定的社会关系，这种社会关系的总合就构成了处于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具有独特的特征的社会。它是现实社会的艺术反映，或者说是艺术地表现了的现实社会。

在《水浒传》社会中，最突出的社会问题，是整个封建统治阶级不可救药的腐朽和没落，是封建统治阶级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从郑屠、西门庆、蒋门神等流氓地痞，到祝朝奉、毛太公、曾长者等豪富恶霸；从富安、陆谦、董超、薛霸等为虎作伥的胥吏，到遍布全国的梁中书、高廉、慕容彦达、蔡德章、贺太

守、程万里等涂炭民生的贪官；从穷凶极恶、祸国殃民的蔡京、高俅，到昏昧荒淫、贪得无厌的宋徽宗——所有这一切，犹如暗无天日的天罗地网，构成《水浒传》社会中的封建统治阶级。他们不仅进行残酷的经济掠夺，如花石纲、生辰纲，以至于阳谷县令也榨取一担金银为蔡京祝寿；而且进行野蛮的政治压迫，或淫人妻女，或欺凌乡邻，或霸人产业，或排挤贤良，“残害良民”，“无所不为”。可见，《水浒传》所描绘的宋徽宗时代是“朝廷不明，纵容奸臣当道，谗佞当权，设除滥官污吏，陷害天下百姓”，“上有秕政，下有菜色”^①，政治极端黑暗、腐朽的时代。

封建统治阶级残酷的剥削和压迫，给下层劳动人民造成超乎寻常的贫困和灾难。在《水浒传》里，这种贫困和灾难的描写是不充分的，似乎作品的着重点并不在此，而在于深刻地揭示被压迫阶级同封建统治阶级的矛盾。这一矛盾，不仅表现为“农夫当午在田，皮焦汗滴，彼公子王孙身居水殿，犹令使人展扇摇风”的阶级对立现象；不仅表现为阶级剥削和压迫，如阮小二说：“如今那官司一处处动弹，便害百姓，但一声下乡村来，倒先把好百姓家养的猪、羊、鸡、鹅，尽都吃了；又要盘缠打发他”；而且更集中地表现为“民不堪命”，而举行“撞破天罗归水浒，掀开地网上梁山”的反抗斗争。梁山义军的成分很复杂，帝子王孙、豪富将吏、猎户渔人、屠儿刽子、行商坐贾、铁匠医生、游民散卒、三教九流无所不包；但其基本力量是农民和手工业者。所谓：“农夫背上添心号，漁父舟中插认旗”。不仅那些“啸聚山林”的众多义军，如少华山、桃花山、二龙山、清风山等，动辄千百人，多由农民和游民组成；而且，晁盖、穆弘等上梁山时，那些“愿去的”庄客都“打拴行李”，“一同便往”，李应庄上的“庄客并老小”也“队队上山来”，壮大了起义队伍。而阮氏三雄、武松、李逵、宋江、二解等

① 汪道昆：《水浒传序》，天都外臣本《忠义水浒传》卷首。

人的生活经历，更展现了不同出身的农民“逼上梁山”的不同道路。

在《水浒传》社会中，疏财仗义，劫富济贫，打抱不平，占山为王，已形成普遍的社会风气，更加促进了社会危机。如史进因结交少华山而弃家，鲁达因为金老汉父女打抱不平而逃难，晁盖广交四海英雄，柴进门招天下好汉，都生动地说明了中等阶级人们对被压迫人民的同情和支持。他们之所以铤而走险，既由于封建统治阶级的政治迫害，也由于席卷《水浒传》社会的农民革命浪潮的推动。《水浒传》中英雄好汉反迫害、反暴力的斗争，实质上是农民阶级与封建统治阶级斗争的反映，所以，他们的斗争“终究汇合到农民起义大斗争中去”。①

显然，《水浒传》社会是北宋末年中国封建社会的典型概括，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矛盾。封建统治阶级的政治危机，统治阶级残酷的剥削和压迫所造成的被压迫阶级超乎寻常的贫困和灾难，以及“官逼民反”的社会风气，这些不依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变化，形成《水浒传》社会的革命形势。这一革命形势，加上农民革命英雄们积极地发动旨在“反抗政府”（鲁迅语）的群众运动（如晁盖等七人一上梁山就无情地惩罚了追捕的官兵，又如宋江在未上梁山前就积极地招兵举将，联络四方豪杰），于是就产生了革命。梁山泊起义正是农民阶级同地主阶级矛盾激化的产物，而不是统治阶级内部斗争的结果，因此是一场反对封建统治阶级的农民革命。

有的论者被《水浒传》作家力图将农民起义纳入“奸佞残忠义”、“奸邪屈有才”的范围的封建思想所迷惑，认为“《水浒传》主要描写了地主阶级内部进步力量与腐朽力量即革新派与守旧派的矛盾斗争”②，用宋江“借得山东烟水寨，来买凤城春色”的思想，

① 邓雪峰：《回答关于〈水浒〉的几个问题》，《论文集》下。

② 王齐洲：《〈水浒传〉是描写农民起义的作品吗？》，《水浒争鸣》第一辑。

来解释由“逼上梁山”的典型形象和典型情节所反映的被压迫人民与统治阶级的矛盾斗争，从而忽视了《水浒传》社会的基本性质及其革命形势，颠倒了《水浒传》中社会矛盾的主次关系，因而不能正确认识《水浒传》的性质与意义。

《水浒传》从社会根源上揭示了“官逼民反”的阶级斗争规律。梁山泊起义是地主阶级残酷的剥削和压迫的结果，尤其是统治阶级反动的政治统治的结果，因此是不可避免的、正义的斗争。“乱自上作”、“洪太尉误走妖魔”和高俅君臣际遇的故事，寓意正在于此。“逼上梁山”，是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的必然产物，也是千百万劳动群众力求摆脱地主阶级残酷的剥削和压迫的唯一出路。

由于梁山泊农民革命是“被人逼迫，事非得已”的，是忍无可忍的，所以具有自发性。这种自发性所包含的反抗与保守的双重要素，极大地影响了梁山泊农民革命的对象、任务和前途。

二

当梁山义军形成之后，《水浒传》社会的主要矛盾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矛盾，就集中地体现为梁山起义军与封建统治阶级的矛盾。因此，梁山泊农民革命的主要打击对象就是权奸邪佞、赃官污吏和豪富恶霸。

首先，梁山义军主张“酷吏赃官都杀尽”，摧毁各级封建官僚机器，镇压作恶多端的贵族官僚。如攻陷青州，斩尽知府慕容彦达全家；智取华州，杀死作恶多端的贺太守；两赢童贯，三败高俅，更把如狼似虎的封建军队打得落花流水。其次，梁山义军还横扫封建王朝的社会阶级基础——地主阶级。七十一回写道：

折莫便是百十里、三二百里，若有钱财广积害民的大户，便引人去公然搬的上山，谁敢阻当。但打听得有那欺压良善暴富小人，积攒得些

家私，不论远近，令人便去尽数收拾上山。如此之为，大小何止千百余处。

而三打祝家庄、两攻曾头市，更是大规模的打击豪强的军事行动。这一方面最突出地表现了梁山义军的农民反封建革命性质。试想，如果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与那一派的斗争”，梁山义军为什么如此广泛地打击封建地主阶级呢？这不是“为渊驱鱼”，反而孤立了自己的力量吗？显然，这是被压迫阶级反对压迫阶级的阶级斗争。

有人说：梁山义军只反贪官，不反清官。是的，但这正是现实的要求。贪官代表了封建统治阶级中最黑暗、最反动的势力，对人民群众的压迫和剥削最残酷、最毒辣、最明显，当然是农民革命的主要对象。而把批判的矛头指向“清官”，是资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以后的事，如《老残游记》所描写的那样。从这里我们也看到，农民革命并不是以整个封建地主阶级为打击对象，而是以地主阶级中的恶势力为打击对象的；越是在封建统治腐朽、没落的时期，这种恶势力越为普遍，而农民革命的对象就越广泛，斗争就越激烈。

有人说：梁山义军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确，《水浒传》虽然在客观上揭露了宋徽宗是祸国殃民的罪魁祸首，梁山义军打击官僚和地主的活动也给封建王朝造成了实际威胁：“搅扰得道君皇帝龙盘椅上魂惊，月凤楼中胆裂”，显示出“兀自要和大宋皇帝做個对头”的政治倾向，但却从未明确地把皇帝当作革命的敌人。然而，这只能说明梁山泊起义的特殊性，说明它在反映农民觉悟的程度上没有达到封建社会农民革命应有的高度，而不能因此否定它的反封建农民革命的性质。因为它始终是以贪官酷吏、豪富恶霸为敌的，而这正是封建统治的基础；同时，它始终是以保护人民、拯救人民为目的的，表现出鲜明的阶级倾向。

既然梁山泊农民革命是封建地主阶级残酷剥削和压迫的结

果，而革命对象主要是封建统治阶级的社会基础——赃官酷吏和豪富恶霸，那么，与之相适应的，革命的主要任务就是反对封建统治阶级的剥削和压迫，具体地说，就是反对封建剥削制度所造成的财产的不平均和反对封建等级制度所造成社会地位的不平等，所谓“取其非有官皆盗，损彼盈余道是公”和“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这一点从根本上决定了梁山泊起义的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性质。

但是，如果说梁山义军不能自觉地制定彻底推翻封建制度和封建地主阶级的革命任务，是由封建社会农民阶级的阶级局限性和农民革命的历史局限性所决定的，而没能象太平天国革命那样从生产资料所有制上提出农民的要求，也还是时代使然；那么，梁山义军没有象方腊起义那样“自霸称尊”，明确提出夺取政权的要求并付诸实践，也没有象杨么起义那样提出“无赋税差科，无官司法令”^①的革命主张，则表现出浓厚的封建保守性，严重地阻碍了梁山泊农民革命的更大程度的发展，这是导致其走向“受招安”道路的重要原因。倘若用农民革命推翻封建王朝后也只能再建立一个新的封建王朝的理论为依据，来为梁山义军革命任务的严重局限性辩护，就会忽视梁山农民革命带有浓厚的封建保守性的特点；反之，倘若以梁山义军不反皇帝、不反清官为论据，断定它“维护、巩固封建统治政权”，就会抹杀梁山泊农民革命以反对封建统治阶级的剥削和压迫为己任的革命性质；——这两种片面观点，都不能正确认识和评价《水浒传》的思想意义。

梁山泊农民革命的对象和任务表明，封建社会的农民革命只能是自发的反对封建制度的革命，而不是自觉的推翻封建制度的革命。这是因为，农民阶级不是新的生产力的代表，不可能提出一个没有皇帝的理想的社会方案，而农民革命也不是根源于新的

① 李纲：《梁溪全集》，卷七五。

生产力反对旧的生产关系的社会矛盾运动的，而是封建社会自身矛盾激化的结果。在新的生产力未曾产生时，任何对旧的生产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社会关系的变革，都不可能是彻底的；但是这种变革本身，却是带有革命性质的。

梁山泊农民革命的对象和任务还表明，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农民革命只有明确地提出推翻封建政权的革命目标，才能更有效地促进革命的蓬勃发展，才能更有力地打击黑暗的封建统治和残酷的经济剥削，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反之，则不仅阻碍了革命的胜利发展，还会象梁山义军那样导致毁灭的悲剧结局。

三

一说到梁山泊农民革命的指导思想，人们就会提到“替天行道”的口号。诚然，农民革命总是把自己的理想、愿望、要求等，以最简洁的文字形成政治纲领式的口号，标举在它们的旗帜上的；但是，具有实质性意义的却不在乎口号本身，而在于口号所蕴含的现实内容及其实践意义。

“替天行道”作为农民革命的政治纲领来看，包含着依靠自己的力量实现自我解放和改变不合理的现实状况的双重意义，因此有着深刻的概括力。“天”，不管是“天意”、“天理”还是“天子”，实际上不过代表一种外部的凭借力，所谓，“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之意；只有“行道”本身，才具有实质内容。那么，梁山义军“替天行”的是什么“道”呢？九天玄女说是：“为主全忠仗义，为臣辅国安民”，似乎没有超出封建秩序、封建道德允许的范围；其实，“盗有道，将非君子之道也”^①，梁山义军的革命实践却截然不同。在政治上，他们“锄暴安良”，要“掀翻天地重扶起，截破苍穹

① 陈忱：《水浒后传》论略》，清绍裕堂刻本《水浒后传》卷首。

再补完”，打击贪官污吏、豪富恶霸，“扶危济困”，舍身为人，维护被压迫人民的利益；在经济上，他们“杀富济贫”，“打家劫舍”，“抢掠官厥”，夺取“不义之财”，“将钱粮一分发送梁山泊，一分给散居民”，“但得府库之物纳于库中公用，其余所得之资并从均分”；在道德上，提倡“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竭力同心，共聚大义”，“交情浑似股肱，义气真同骨肉”，“死生相托，吉凶相救，患难相扶”。

可见，所谓“替天行道”，实际上体现了农民阶级的平等思想，同钟相“等贵贱，均贫富”^①的口号在实践意义上有一致性，是一种农民社会主义乌托邦思想。连统治阶级也认识到“替天行道”是“曜民之术”，表达了人民的利益和愿望。梁山农民革命的平等思想，是《水浒传》社会极端不平均、不平等的现实的产物，归根到底又是宋元时期严重的贫富不均、富贵不等的社会现实的产物，反映了现实中的农民革命实践，如李顺“初起，悉召乡里富人大家，令具其家所有财粟，据其生齿足用之外，一切调发，大赈贫乏”^②，就是一例。明确地提出经济和政治上的平等思想，是宋元时期农民革命的突出特点。梁山义军揭橥“替天行道”的大旗，实质上就是用暴力行动推行平均主义，力图改变自己的生活命运。在这里，《水浒传》所表达的客观思想，同作者那种“时来富貴皆因命，运去贫穷亦有由”的宿命、保守思想迥然相反。

作为梁山农民革命的指导思想的农民阶级平等思想，“是农民运动中最革命的思想”^③因为它反映了反对封建制度的斗争，因为它是农民阶级反抗封建制度的推动力。同时，它又是农民阶级“革命本能的简单的表现”，“是对极端的社会不平等，对富人和穷人之间、主人和奴隶之间、骄奢淫逸者和饥饿者之间的对立的自

① 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一三七。

② 沈括：《梦溪笔谈》，卷二五。

③ 列宁：《俄国革命的长处和弱点》，《列宁全集》第十二卷第341页。

发的反应”^①。平等思想的自发性，决定了它不可能形成独立的、系统的、完善的思想体系；平等思想的阶级性，也决定了它自身存在着维护小私有制和实现无剥削、无压迫愿望的矛盾二重性；平等思想的历史局限性，还决定了它归根到底是建立在封建的经济基础之上的，同封建主义的思想体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然而，平等思想在反对封建专制制度、反对封建剥削制度的斗争中，具有鲜明的革命性与民主性的实质，却是不可否认的。梁山义军以平等思想为指导思想，同样决定了它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性质。

在封建社会里，农民阶级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封建统治思想的熏陶、蒙蔽或支配。但是，正因为梁山泊农民革命以平等思想为指导思想，所以，在革命向前发展时期，各种形式的封建传统思想总是由平等思想所制约的，平等思想为这些封建传统思想形式注入了新的内容；反之，在革命倒退时期，封建思想则取平等思想而代之，甚至吞没了平等思想。

例如皇权思想，在梁山义军中显然有普遍影响。皇权思想，实质上是封建等级观念的极端化表现。不能以反不反皇帝作为有无皇权思想的标准。朱元璋不是反皇帝的吗？但他不仅登上皇帝的宝座，而且推行了严酷的专制。由于封建思想的统治作用，由于农民阶级“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来保护自己的阶级利益”，而必须由“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②来代表他们，因此农民革命往往带有皇权思想。但是，在革命向前发展时期，梁山义军中的皇权思想却包含着革命的内容。宋江说：“盖因朝廷不明，纵容奸臣当道，谗佞专权，设除滥官污吏，陷害天下百姓”，因此要“替天行道”，打击封建统治。李逵说：“你的皇帝姓宋，我的哥哥也姓宋，你做得皇帝，偏我哥哥做不得皇帝？”又说：“我们有许多军马，便

①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146页。

②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693页。